

目 录

导言 汉语——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1
第一章 汉语的起源	2
一 追根溯源	2
二 河南安阳的发现	4
第二章 汉语语音的演变	6
一 谐声字中有奥秘	6
二 《诗经》的启示	7
三 古无轻唇音——唇音的分化	9
四 古无舌上音——舌音的分化	11
五 谐声字里的特殊情况	13
六 奇妙的反切	15
七 《广韵》：了解中古语音的字典	16
八 三十六字母——守温和尚的创造	18
九 《中原音韵》：现代汉语语音的源头	20
十 现代“j、q、x”的来历	23
十一 李白的千古绝唱	25
十二 粤方言里的遗迹	26
第三章 汉语词汇的演变	28
一 “不”与“非”同出一源	28
二 古代同类器物名称多	30
三 表意的需要——音节的复杂化	31
四 识其字却不解其意	33
五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	35
六 佛教徒对汉语词汇的贡献	37
七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影响	39
八 西学东渐：西方语言词汇的引进	40
第四章 汉语语法的演变	43
一 “阿瞞”的传说	43

二 “晨起洒扫，食了洗涤”与动态助词	47
三 “之”和“者”的变迁	48
四 古人说话量词少	50
五 宾语前置说词序	53
六 表达被动方式多	54
七 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	57
八 越来越长的修饰语	59
第五章 汉语方言的发展	61
一 “买璞”的笑话	61
二 从苏秦挂六印说古代共同语	63
三 北方大移民与古代方言的演化	65
四 现代七大方言的差异	69
五 方言大区划中的小区划	74
六 汉语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	77

导言 汉语——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当我们回顾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回顾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时候，少不了要追溯这个民族的语言史，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一些民族因失去或放弃了自己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尤其是民族自身的语言而逐渐为其他民族所同化。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屡经挫折，罹患过无数次的灾难，却一直生生不息，不断地发展壮大着。其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能长存不灭，除了别的一些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始终拥有和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语言文化密不可分。

汉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至今仍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因此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不可忽视对汉语的历史的了解。

汉语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说它的历史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的长，一样的久。在这样长的历史中，汉语曾发生过许多变化，以致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还很明显。了解一点汉语发展史上的这些变化和差异，了解一下汉语是怎样从古代的形式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形式，不仅会使您增长许多有益的知识，也可使您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深入了解我们民族自身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历史。

那么，汉语究竟是如何演变，如何发展的呢？下面就为您慢慢道来。

第一章 汉语的起源

一 追根溯源

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一二百万年前，当人类的祖先刚刚产生之时，人类便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然而时光流逝，万物变迁，语言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时至今日要了解人类最初使用过的遥远的早期语言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十分可幸的是，语言学家们还是发现了远古语言的一些蛛丝马迹，从中也寻找到了汉语的来源。

语言学家根据各种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远近或共同成分的多少推测出世界上存在着几大语系，它们是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以及非洲、美洲的一些语系等。这些语系在远古时代实际即表现为人类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几种古老的母语，亦即古汉藏语、古印欧语、古闪含语、古乌拉尔—阿尔泰语、古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等。现在的数量众多的语言都可分别归属这少数的语系，或者反过来说，它们都是由上述少数古代母语逐步分化演变而来的。我们的汉语即归属于汉藏语系，它是从古汉藏语一步一步分化发展而来的。

古汉藏语是汉语及其亲属语言的源头，由它分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据查大大小小不下三百种，比如像汉语、藏语、泰语、苗语、瑶语、侗语、壮语、彝语、黎语、景颇语、布依语、哈尼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等就都是。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母亲”，因此有着亲属关系，是亲属语言。它们的分布面积很广，西自克什米尔，中经西藏高原，沿着亚洲的南部，一直延展至中国东部的太平洋海岸。这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有远有近，因此它们又可分为不同的语族和语支，而这实际上反映了古汉藏语的分化过程：最初先演变成几种古老语言，然后再以这几种古老语言为语族分化出更多的语言，接着再以这些分化出的语言为语支分化出更加多的语言和方言。这个分化演变的过程如同一棵大树从根到叶不断分蘖生长一般。

在今天的世界上，若按使用的人数来讲，汉藏语系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在这一语系中，我们的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而若按单个语言的使用人数来讲，我们的汉语则是全世界所有语言中最大、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汉藏语系的不同语言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表明它们同出一源，同时也是它们与其他语系的语言相互区别的基本标志。这些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汉藏语系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有区别意义的声调(声调表现在每一个音节上)，少的有两个，多的可以有十个以上的声调。我们的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

其二，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是单音节语言，它们的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单音节的词素组成。实际上，这些词素都是由古代的单音词演变而来，这也就是说，在古代，汉藏语系的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节的。这种状况至今仍很明显，比如汉语“我吃饭”、“你喝茶”，一个词一个音节；又比如黎语“hou tai na”(我打他)，也是一个词一个音节。

其三，汉藏语系的语言缺乏像印欧语那样的时、体、数、格之类的形态，主要依靠词的前后顺序的安排来表示语法意义。如果词的顺序不同，意义就不同，例如“我问你”换成“你问我”，意思就不一样。

其四，汉藏语系的语言普遍使用量词。我们的汉语里就有“个”、“只”、“条”、“根”、“本”、“张”、“块”、“棵”、“座”、“片”等许许多多表示事物类别的量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量词，如“场”、“次”、“回”、“趟”、“下”、“记”等。

不过，我们的汉语虽然和自己的亲属语言有着上述共同的基本特征，可在几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它就已经与同系的其他语言分道扬镳，踏上了自己漫长的演变发展的道路。

二 河南安阳的发现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记录了语言。

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我们的祖先，因为若不是他们很早就为我们创制了文字，就不会有古代的文献留存下来，我们也就无法根据古代的文字资料去了解古代的语言。

在汉藏语系中，只有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等极少数语言在古代便创制了文字，而在这少数几种语言中，汉字的创制又要早得多。当然，汉语的历史比起汉字的历史来还要早得多，因为在文字产生前，语言就早已产生了。事实上，汉语的历史少说也有一万年，可惜的是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最早的汉语资料就只有早期的汉字所记载的资料了。

那么，最早记录了汉语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呢？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虽说是最早的文字，可是它的发现却又是最晚的。而说起它的发现来，还颇有些偶然呢！

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这里曾经是殷代的都城，现在称之为“殷墟”——开始出土一些三千多年以前殷商时代的刻有古文字的龟甲兽骨。那时当地的人并不知道这些甲骨的重要价值，他们只是把它们当作药材，用来治疮医病。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它们的价值才终于被认识。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个叫王懿荣的人生了病，医生为他诊脉开处方。当家人按方从中药店里拣回几帖药来之后，王氏在药中发现了一味很不寻常的药，这种药名为“龙骨”。王氏本是金石学家，他发现“龙骨”上刻着文字，于是好奇心起，便追根溯源，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了“龙骨”的货源——河南安阳小屯村。“龙骨”上的甲骨文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由于王懿荣的发现和收集，并由于后代有心人及学者的继续采集和研究，终于确定了甲骨文是现今所知中国最古老文字的地位。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主要都是殷商时期人们祭祀占卜时的事情。当时的人十分迷信，他们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均得听命于上天、听命于鬼神，因而事无巨细必先占卜。这样，占卜的内容便十分广泛，

包括祭祀、征伐、田猎、年成、疾病、气象、吉凶、出游等许多方面，甚至涉及祭祀时需用牲多少，征伐时用人多少，妇人生男还是生女等事，几乎是无所不卜，无所不问。由于甲骨文内容广泛，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上古汉语的资料。

从甲骨文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汉语与今天的汉语的异同。

从这几个卜辞例可见，殷商时期的汉语在基本词序上已具有了与现代汉语相一致的“主—谓”或“主—谓—宾”的形式(即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若有宾语，宾语又在谓语之后)，但其文法简单，用的大都是不加修饰的简单句，如“子渔亡祸”、“今日雨”、“之夕允雨”等。另外，那时汉语的词类界限也不清，比如“今日雨”的“雨”应是名词，但在句中处于谓语位置，因而又是动词。这种词语跨类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除了语法简单外，早期汉语的词汇量也不能与今天的现代汉语同日而语。据统计，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字总共只有四五千字，而上古汉语的词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也就是说，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词，即使算上同音词的因素，那时的词汇量也不会比文字的数目多多少，可谓非常之少。此外，早期汉语里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语多，而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语少，这也是与当时人的思维水平相一致的。

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比较起来，甲骨文所记载的是汉语早期的形式。汉语的这种早期形式是简单的，它是我们华夏民族幼年时期使用的语言。随着我们民族的成长壮大，汉语也在成长和发展。汉语在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论是在语音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抑或是在语法方面都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第二章 汉语语音的演变

根据汉语历史的客观情况，语言学家把汉语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四大阶段，即上古时期(晋代以前)、中古时期(北宋以前)、近古时期(清代以前)和现代时期(17世纪至现代)。在汉语发展的每一阶段，汉语语音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给我们研究和了解汉语语音的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那么，汉语的语音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规律的变化呢?限于篇幅，对此我们无法做全面的介绍，但从以下若干方面的介绍可以对此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 谐声字中有奥秘

古时候的人早已去世，他们的语音也已消逝。听不到古代的语音，如何去了解古汉语的语音情况呢?我们聪明的语言学家通过各种途径间接地获得了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利用汉字的谐声字来观察和归纳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汉字历史悠久，在上古时就已被创制出来，它们是用六种造字方法造出来的。这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其中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字数量最多，这些字被称为形声字，也叫谐声字。所谓谐声字也就是既有义符(也称形旁)又具有声符(也称声旁)的字。例如“江”这个字既有表示属于“水”的“氵”这个义符，也有表示读音为“工”的声符。又例如“简”，其“竹”字头是它的义符，表示与竹子有关，而“竹”字头之下的“间”则表示“简”字的读音。像这样的谐声字在汉字系统中有很多，它们是我们研究上古音系统的好材料。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第一个系统地利用谐声字的声符考证上古时期汉语语音情况的人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段氏通过考证《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谐声字，得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结论。例如“攻、红、江、空、项、扛、杠、贡、江”等字现在的读音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声符都是“工”，因此在造字的上古时代，它们的读音必是相同或相近的。又例如“招、超、貂、簪、迢、韶、邵”等字都有声旁“召”，

上古时这些字的读音必以“召”音为准，因此在上古音系统中都可归为一个读音。

根据谐声字的声符，我们可以把同一声符的字归为一类，这样一类一类归纳便可较为准确地大致了解上古早期的汉语语音系统。比如说有“工”声符的字，韵母都是“ong”，有“召”声符的字上古时的韵母是“iao”等。而利用谐声字也可了解上古时汉语的声母系统，因为凡是谐声的字，声母必定属于一个总类。例如“工”声符的字声母为“g”，“召”声符的字声母在上古时为舌尖齿龈塞音(传统称为舌头音)“d”。再如“味”和“妹”都从“未”声符得声，可今天“味”的声母是“w”，妹的声母为“m”，似乎很不相同，然而上古时它们的声母决不会如此不同，据研究这两个字上古时的声母都为“m”。现在的“w”声母的字有一部分(如以“万”、“未”、“亡”、“网”作声符的字)的声母实际都是从“m”声母演变而来。

通过归纳古老汉字里存在的大量的谐声字，我们可以获知上古时汉语声韵系统方面的许多情况。

二 《诗经》的启示

比汉字造字时代略晚些，大约在商末周初以至春秋中叶之际，我国出现了一部诗集，这部诗集的名称就叫《诗》，儒家把它尊称为《诗经》。《诗经》是我们汉语言最早的韵文集，它不仅是文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语言学家据以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和依据。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一首诗的片断：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

扫叶山房版《诗经集传》我们且不去评论这首诗的文学价值，仅来看看它的押韵情况。我们知道，韵文是押韵的，可今天读上面这首

古诗却押不上韵了。难道说这首诗本来就不押韵吗？不是的。在古代，这首诗原本是押韵的，因为这首诗每行末尾一字的主元音本来都一样，读音都曾是“ai”，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语音发生了变化，才变得押不上韵的。

了解这种古代押韵而现在不押韵的古诗有什么用处呢？可别小看古代的韵文，因为它们可以给我们许多古音，特别是古韵方面的启示。

语言学家在调查归纳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汉语谐声字和《诗经》的押韵情况。利用《诗经》的押韵最大的用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归纳了解上古汉语的一类一类的韵部。比方说上面《君子偕老》一诗，其中的押韵用字是“珈”、“佗”、“河”、“宜”、“何”，除了声母、韵头外，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曾是“ai”，因此属于同一韵部。从这一首诗我们便可证明同一韵部的几个字。而这些字中的某些字在其他诗中又被用作韵脚而与另外一些字押韵，于是又可将另外一些字归入同一韵部，如此联系下去，便可找到属于一个韵部的许多字。语言学家用一个同韵的代表字来表示这一韵部，称之为“歌”部。语言学家便是这样利用《诗经》的押韵归纳出了上古汉语的一类类不同的韵部的。

顾炎武像最早利用《诗经》研究古韵部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是汉语古韵学的奠基人。古韵学后来又经过清代至民国年间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章炳麟、黄侃等人的研究，日益得到了发展。到了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又对古韵学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使我们对上古的语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据王力先生对《诗经》的考定，《诗经》时代的汉语共有二十九个韵部。下面将这二十九个韵部用国际音标注示如下，以使大家对上古韵部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阴声入声阳声之部 职部 k 蒸部 幽部 u 觉部 uk 宵部 au
药部 auk 候部 o 屋部 ok 东部 o 鱼部 a 铎部 ak 阳部 a 支部 e 锡部 ek
耕部 e 歌部 ai 月部 at 元部 an 脂部 ei 质部 et 真部 en 微部 i 物部 t

文部 n 緝部 p 侵部 m 叶部ap 谈部am 这些上古韵部阴、阳、入三声相配，很有系统性。但到了中古，这个系统就发生了变化。

在《诗经》时代，汉语的声调也与现代、近古乃至中古汉语的声调不同。现代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中古时的四声是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而上古时的四声则是平声、上声、长入声和短入声。所谓入声也就是以塞音结尾的音(发音时只作势，不“爆破”)，如“”读若“sieg”，“急”读若“gieb”，“灭”读若“miad”。本书除个别语音表中用国际音标注音外，一般采用汉语拼音标音，若遇汉语拼音字母系统缺少的浊音，则在其右上方标“”符号以示浊音，如“b”为清音，“b”为浊音。上古、中古时汉语都有入声，但上古时入声有长短之分，长入声后来变成了去声，而短入声到了中古仍然是入声。这从谐声字的情形可以看出，比如“拭”与“试”声符相同，因此上古时读音相同，同为“xie^g”，可在中古时“拭”仍读作“xie^g”，还是入声，而“试”则读为“xie”，脱落了入声韵尾“-g”，变成了去声。现在的一些南方话如上海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特点，因此读“拭”时音短促，读“试”时音舒缓，这也是证明。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声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事实上，语言学家常常将谐声字和《诗经》的押韵结合起来，以此考证上古时期汉语的韵部。

通过对谐声字和《诗经》韵部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上古的汉语与今天的汉语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三 古无轻唇音——唇音的分化

上古时代的汉语声母与相隔久远的现代汉语的声母自然有着不小的差别，而且即使与邻近的中古时代——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声母相比，也有若干明显的不同。汉语史上有所谓“古无轻唇音”之说，这便是指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所具有的一大特征。

何谓“古无轻唇音”？这要从“唇音”这个术语讲起。唇音指的是声母的一类音，也就是发音时从双唇或唇齿部位发出的音，如现代汉语的“b”、“p”、“m”、“f”四个音即是，“b”、“p”、“m”是双唇音，“f”是唇齿音。所谓轻唇音就是指像“f”这样的唇齿音。在古时候，汉语的声

母有清音和浊音的区别，因此除了有“f”这个清音轻唇音外，还有“v”等浊音轻唇音。而与轻唇音相对还有重唇音，重唇音即指用双唇发出的音。古时候，重唇音也有清浊之分，既有“b”、“p”这样的清音，也有“b”这样的浊音。所谓古无轻唇音就是说在上古时代汉语里不存在“f”、“v”这样的轻唇音声母，而只有重唇音声母。轻唇音声母是后来从重唇音声母中分化出来的。

最先发现古无轻唇音的人是清代的学者钱大昕，他说：在上古时代，“负”读如“背”，“附”读如“部”，“佛”读如“弼”，“逢”读如“蓬”……这就是说，现代凡是读轻唇音声母的字从前都读作重唇音声母的字。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主要根据是古人所写的别字，他在读古书时看到古人有时把“阿房宫”写成“阿旁宫”，把“汾水”写成“盆水”等，于是发现了轻唇音与重唇音的关系。钱大昕是正确的，上古时，我们的汉语确实只有重唇音。

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古音只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的情况还可以从谐声字方面得到验证。比如带“甫”这个声符的谐声字有“辅”、“脯”、“捕”、“哺”、“铺”、“莆”、“匍”、“浦”、“埔”、“圃”、“敷”、“傅”、“缚”、“博”、“搏”、“膊”等，它们声旁相同，可声母却分为两类，一类读轻唇音“f”，一类读重唇音“b”、“p”，这就是因为现在凡是有“甫”这个声符的字从前皆读重唇而后来分化了，所以才出现了重唇、轻唇两类读法。如今我们称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为“Du Fu”，可在当时则称作“Du Pu”。

在今天的一些汉语方言——特别是南方的吴方言(苏南、浙江话)和闽方言(主要在福建地区)中还保留着轻唇音读如重唇音的现象。拿吴方言的上海话来说，至今仍有一些轻唇音的字保留了重唇音的读法。如“孵小鸡”，北方话说“fu xiao ji”，上海话则说“bu xiao ji”，把“孵”读作“bu”。又如上海人把“打预防针”说成“dang yu bang zeng”，其中“防”读作“bang”。闽方言对上古唇音特点的保留更是充分，凡在普通话里读轻唇音的字在闽方言中都读作重唇音，如把“分”读作“bun”，把“房”读作“bang”，把“蜂”读作“pang”，把“缚”读作“bog”，等等。其

实，在今天的一些地名中也还保留着一些轻唇音读如重唇音的例子，如广东省“番禺”县不读“fan yu”，而读“pan yu”。此外从一些吸收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外语如朝鲜语中也可看到这方面的遗迹，例如朝鲜语说“方”为“bang”，说“夫”为“bu”，说“反”为“ban”，说“凤”为“bong”，等等，声母皆为重唇音。

上古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里只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这是当时汉语语音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四 古无舌上音——舌音的分化

上古时汉语的声母从发音的部位上讲有两个与后世不同的重要特点，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古无轻唇音”，还有一个则是“古无舌上音”。

所谓“舌上音”也是传统音韵学的叫法。这类音在过去究竟怎样发音，其发音部位在何处，现在已经不易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发音部位一定近似现代汉语里的舌尖后音——即翘舌音，因为它是现代翘舌音声母“zh”、“ch”的来源之一。不过，说它近似则又是说这类音还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翘舌音，因为它还未最后演变为现代翘舌音。传统的音韵学习惯用“知”、“彻”、“澄”这几个字(只考虑其声母)来表示舌上音。古时候的汉语声母是有清浊之分的，因此“知”、“彻”表示清音，“澄”则表示浊音。用保留了古浊音发音方法的吴方言可以区别“澄”与“知”、“彻”在清浊上的不同，在吴方言中“知”的声母为“z”，“彻”的声母为“c”，“澄”的声母则为“s”。

从今天的角度看，曾经属于舌上音的汉字现在的声母都是翘舌音，比如：

zh 知直兆召罩著柱驻仲重郑转篆传撞宙昼

ch 彻澄呈瞠超潮拆厨畜矗持池迟耻锤宠抽

可是这些字的声母在古代却并不读作“zh”、“ch”，它们在中古时是舌上音，而在上古则是舌头音。

什么是舌头音呢？舌头音和舌上音都属舌音的范畴，舌头音就是像“d”、“t”这样的舌尖塞音，音韵学上习惯用“端”、“透”、“定”等字

来表示。“端”和“透”分别代表清音“d”、“t”，“定”则代表浊音“d”。“知”、“彻”、“澄”所代表的舌上音就是从“端”、“透”、“定”所代表的舌头音分化而来的。由于舌上音来自舌头音，因此它的读音必定也类似舌头音，所以语言学家拟测舌上音为介于舌头音和翘舌音之间的舌面塞音。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凡是上古时属舌头音的汉字有一部分一直保留舌头音的读法而延续到今天，这部分字的声母现在仍读“d”、“t”，但少了浊音“d”，另一部分则演变成了舌上音，以后又渐渐与另外两类声母演化来的音合并，变为现代的“zh”和“ch”。

在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里还不存在舌上音，那时的舌上音都读如舌头音，这也就是说，像上面所列的那些字的声母在上古时候都是“d”、“t”、“d”。比如那时候“知”读如“die”，“彻”读如“tiad”，“澄”读如“dien g”。又比如“猪”读如“dia”，“处”读如“tia”，“茶”读如“dia”。春秋时的孔子说过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在当时的读音若让今天的人听来就好像是“爹爹为爹爹，不爹为不爹，是爹也”，与今天的语音差别是很大的。

古无舌上音的特征从今天的闽方言可以得到证明，因为闽方言保留了上古汉语舌音的特点。在闽方言里“知”被读作“di”，“朝”被读作“diao”，“猪”被读作“di”或“dü”，“中”被读作“diong”，“抽”被读作“tiou”，“尘”被读作“din”。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称“茶”为“tea”，实际英语这个词就是早先从保留了古舌音特点的闽方言借去的。

古无舌上音的情况也可以从谐声字中看出。例如“涂”和“除”、“独”和“浊”、“都”和“猪”、“汤”和“畅”这几对字现在声母不同，但它们有共同的声符，说明它们在上古时读音一定近似。上古时，“除”、“浊”、“猪”、“畅”的声母是跟“涂”、“独”、“都”、“汤”一样的，全都是舌头音。

下面以传统音韵学所用汉字表音的方法加现代注音的方式列出一个上古汉语的声母表，从中可以了解上古时代的汉语里有哪些声母，没有哪些声母：

帮 b 滂 p 并 b 明 m 端 d 透 t 定 d 泥 n 精 z 清 c 从 z 心 s 邪 s 照 j 穿 q 床 j 审 x 禅 x 见 g 溪 k 群 g 疑 ng 影(零声母)晓 h 匣 h 来 l 日(舌面音, 近似“泥”母)

以上是汉语声母在上古时代的一般情况。下面再给读者介绍一点上古时代早期汉语声母的特殊情况,这类特殊情况是从谐声字中发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声母的一些更为古老的痕迹。

五 谐声字里的特殊情况

汉字系统中大量的谐声字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上古汉语语音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信息,这种特殊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上古时代,汉语可能有过复声母。

所谓复声母也就是指两个辅音结合在一起位于音节开头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外语里看到,比如英语的“star”(星星)一词之前有“st”,“plan”(计划)一词之前有“pl”,“blood”(血)一词之前有“bl”,“flee”(逃走)一词之前有“fl”,“sky”(天空)一词之前有“sk”等,这些都是两个辅音结合在一起用于音节开头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里是不存在这类复声母的。可是在上古时代的早期,汉语里却很可能有过复声母。

我们知道,谐声字中声符相同的字上古时应该同音,但是由于语音的分化发展,声符相同的字在今天的读音已有很多变得不相同了,其中很多不同表现在声母方面。例如“杠”和“江”这两个字的声符都是“工”,可现在“杠”的声母是“g”,“江”的声母是“j”,二者已经不同。不过,这种不同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演化造成的,因为“江”的声母“j”实际是由“g”演变来的。又如“招”和“貂”都有“召”声符,这两个字在上古读音应相同,可今天“招”的声母为“zh”,“貂”的声母为“d”,也发生了分化,但这种分化也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演化而造成,因为“招”字的声母“zh”是由“d”演变而来。

可是有这样一些同声符的谐声字,它们今天的声母读音的不一致并不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分化所造成。例如“獭”和“癞”这两个谐声字都具有同一声符“赖”,应该说它们在上古时的读音是相同的,可它

们现在的声母一是“t”，一是“l”，二者不但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非像“杠”与“江”或“招”与“貂”的不同声母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这也就是说“t”声母不是由“l”声母分化而来，“l”声母也不是由“t”声母分化而来，可是声符相同的字在上古时又应该是同音的。如何解释这个疑问呢？这方面的解释看来只有一个，即很久以前，大约在上古早期或造字的时代，汉语里不仅有单音声母，还可能存在过复音声母。由“獭”和“癞”的声符相同而声母不同的情形推论，上古汉语里可能曾有过“tl”这样的复声母，“獭”和“癞”在上古早期的读音可能是“tla d”（以“赖”为声符的字上古时有入声韵尾“-d”）。“獭”与“癞”的声母不同可能就是由“tl”这个复声母的分化所造成，“獭”保留了复声母“tl”中的“t”音，丢失了“l”音，而“癞”则保留了复声母“tl”中的“l”音，丢失了“t”音。同样的例子又如“體”（“体”的繁体字）和“禮”（“礼”的繁体字）都有“豊”这个声符，可“體”的声母为“t”，“禮”的声母为“l”，它们的声母并非由一个单音声母变化而来，因此只能说明上古时曾有过“tl”这样的复声母。

除了“tl”以外，上古时还可能有过“gl”、“bl”等复声母。例如“监”这个字古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声母一直是“g”，可是以“监”为声符的许多字如“藍”、“籃”、“𩇛”、“濫”的声母却都是“l”，而且声母“g”与声母“l”并不存在由同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在上古的造字时代很可能曾经有过“gl”这样的复声母，而以“监”为声符的字在上古早期可能读作“glam”一类的音（“监”声符的字古代的鼻音韵尾是“-m”，不是“-n”）。又例如“稟”这个字的声母是“b”，但以它为声符的“凜”、“凜”、“凜”、“廩”等字的声母却是“l”，声母“b”与声母“l”之间也不存在由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的关系，因此上古造字时代很可能也曾有过“bl”这样的复声母，而以“稟”为声符的字上古早期的读音可能是“bliem”（这些字古代的鼻音韵尾也是双唇的“-m”）。

从谐声字所提供的这些特殊的古老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汉语的声母在上古时代的早期可能发生过的变化。

上古汉语的语音具有它自身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在向中古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在发生着变化，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唇音和舌音就发生了分化，而这些变化的发现都离不开古代——特别是中古时代古人对汉语语音的记录，因此后面我们将介绍一些那个时期古人对汉语语音记录的情况，从中我们也可看到汉语语音在中古时代的演变。

六 奇妙的反切

六朝时，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经耗资百万，在京都建康城(今南京市)郊差官督造了一座宏伟寺庙，其中殿刹禅房数千百间，僧徒无数，信众云集。这座著名寺庙名为“同泰寺”，寺内一座大门名为“大通门”。当时为这座庙宇和这座门起这么两个名字是颇费了一番巧妙心思的。其巧妙就巧妙在“同泰”可寓意“大通”，而“大通”也可寓意“同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同泰”和“大通”可以颠过来倒过去地互相注音。“同泰”即“大”(取“同”的声母和“泰”的韵母及声调相拼。“大”的古音近似现在“大夫”的“大”)，“同泰”反过来为“泰同”，用同样的方法也可表示“通”；而“大通”即“同”(“大”和“同”的声母古代都是浊音“d”)，反过来“通大”即“泰”。如此相互注音实在是妙不可言。这就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叫做反切。

反切之法兴起于汉魏之际。当时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可是宣讲佛教教义的佛经是用梵文书写的，而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受这种拼音文字的影响和启发，当时的人也开始对汉语的音节结构有了认识。他们将汉字的音节分成声、韵(包括声调)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反切注音法。

反切注音都是选用两个汉字来进行，前一个汉字称作反切上字，后一个汉字称作反切下字，反切上字只取其声母，反切下字则只取其韵母和声调，这样将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声调合二为一，就可拼出一个新的声、韵、调俱全的音。前面说的“同泰”、“泰同”切“大通”，“大通”、“通大”切“同泰”就是这样拼出来的。

反切法产生之后就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应用于古代的韵书如《广韵》、《集韵》等文献中。这样，反切法就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音